

江文也与厦门

曹国梁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江文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蜚声国际的声乐家及作曲家, 从1916年举家迁入厦门至1923年赴日本留学, 共在厦门生活了六年。文章通过实地考察、查阅原始资料, 梳理、考证了江文也在厦门的几个重要活动地点, 如居住地、旭瀛书院、基督教青年会, 江文也的父母、伯父、兄弟等在厦门的足迹, 以及江文也与厦门相关的创作。从中窥探出这6年的厦门生活给江文也的一生带来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 江文也; 厦门 “水仙宫”; 旭瀛书院; 厦门基督教青年会

中图分类号: J609.2; J6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389(2011)04-0047-09

江文也(1910-1983年)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蜚声国际的声乐家及作曲家”^[1]。他出生在台湾省台北县大稻埕, 祖籍是闽西永定县客家人。1916年随父母迁居厦门, 7岁入旭瀛书院接受早期教育。1923年赴日, 在日本甚至国际音乐界获得至高荣誉。1938年返回祖国, 从此定居大陆, 从事音乐教学和创作。1983年10月因患脑血栓病逝于北京。在对江文也的生平简介中, 厦门这六年, 往往是一笔带过, 具体到江文也出入厦门的时间、家人、在旭瀛书院的时间和学习情况、与厦门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以及后来与厦门的相关联系及创作等, 在国内外的学术研究中涉及较少或过于杂乱。因此本人产生了要对他厦门生活的6年时间及活动, 做一个比较深入详细的梳理、考证的想法。随着对江文也的研究不断深入, 才发现在厦这六年的孩童生活, 对他的音乐成就和音乐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

一、江文也出入厦门

1. 江文也入厦

江文也祖籍福建永定县南隅的高头乡, 是福建有名的客家山区, 该乡自元朝以来就有大批江姓族人定居于此, 现在的高头乡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为江姓族

人。康熙年间开始有江姓氏人入住台湾岛, 清末江文也祖父因家乡连年饥荒, 为了做番事业, 也只身到台湾垦荒, 随后又经商, 生意较好。至江文也父辈时, 开始内迁。江文也随家人于1916年一同迁居厦门, 居住在厦门水仙宫后岗三十六崎顶处, 是一个文人荟萃之地, 文化交往和商业进出频繁。“水仙宫”(又称为水仙庙)位于鹭江西南海岸, 依山傍海、山清水秀, 初建于明代, 属俗神庙宇, 庙内祭祀大禹、伍子胥、屈原、项羽等闽俗水神。1928年厦门路政处修造鹭江道堤岸时, 水仙宫被拆除, 宫址被售卖。只留下水仙宫、水仙路、水仙码头几个名称, 供后人感慨世事沧桑(见图1)。在紧靠“水仙宫”后面右侧有一片小山岗, 虽然比较小, 但是在该处也算是最高的地方了, 当地人叫做“三十六崎”, 所谓“崎”是闽南语中楼梯、台阶的意思。沿着弯曲的台阶而上, 在石岗顶部有着多处阡陌纵横交错的房建, 江文也举家迁居厦门时就居住于此。经过历史上多次改城扩建, 水仙宫三十六崎顶处江家房建已无任何痕迹, 但是“三十六崎”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就是现在的“三十六崎巷”, 巷子弯弯曲曲, 纵横交错, 紧靠着“水仙路”。1922年, 因厦门同文书院^①校舍建于三十六崎顶旁, 便有了同文顶, 后来人们渐渐把同文顶称为

收稿日期: 2011-05-10

作者简介: 曹国梁(1981-)男, 山东菏泽人,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2008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音乐史研究。

^① 厦门同文书院, 创建于1898年, 由厦门爱国华侨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 早期聘请多为美国领事担任院长。主要教授英语, 另开设中文、算术、生物、物理、化学等。校址初建于三十六崎顶的山脚下。1922年同文书院校舍从脚下搬迁至山顶, 就在三十六崎顶旁, 正因为同文书院的校舍落成, 所以将原先的“凤凰山”改名为同文顶。

该处的统称，一直留用至今。

至于“水仙宫”具体什么模样，厦门文史界没有相关的照片，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英国人约翰·汤姆森在19世纪后期拍摄的“水仙宫”的老照片，基本可见它历史原貌。如今，水仙宫遗址不复存在，原址为现在的鹭江道和水仙路的交汇处，只有后方的那块“水天一色”石仍然矗立在那里，形状至今没有改变。



图1 “水仙宫”^①

江文也及家人定居“水仙宫”时，此处正是全厦门最为繁华的街道之一，旧的电报局、电话公司、银行等机构均设在这里。“江文也定居厦门以后，住处正好是当地文人墨客会集之地，南音、北调终年不断。江文也的父亲交友甚广，经常与各方士绅聚会，谈论文化艺术。这些都对幼小的江文也影响颇深”，“幼小的他，不但能用日文写诗，还擅长用闽北、闽南和闽中的各种腔调，有腔有调地演唱《天黑黑》等当地民间小调。江文也的三伯父住在厦门鼓浪屿。在三伯父处，他不但能学到西方传来的科学知识，也有机会接触到钢琴、小提琴、风琴等西洋乐器和五线谱等音乐知识。求知欲强烈的少年江文也如鱼得水，经常住在鼓浪屿，不想回家。”^[2]同时，每逢节日，喜随母亲逛庙会，欣赏各种民俗活动。确切的说，在厦门的童年生活体验加上家庭的熏陶与教育，为江文也的音乐个性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2. 江文也出厦

1923年8月，江文也的母亲离世，家庭产业经营

不佳，其父一直奔碌于家族生意，无暇照顾江文也。同时，也是考虑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加上“其兄江文钟已在日本求学，寄宿于日本的管家中，因两兄弟可相互照应，父亲也将江文也送往日本读书”，“由于他在厦门就读的是日所学校，所以并无语言上的困难”^{[3]156}。于是，该年江文也结束了旭瀛书院的学习，8月26日赴日本长野县求学，“江文也先进入上田南寻常小学六年级就读，翌年春进入上田中学就读。1928年中学毕业后，考入东京武藏高等工业学校，就读电气科，1932年毕业”^{[4]131}。同时，他又报考了东京上野音乐学校夜校，业余学习声乐。至此，江文也开始了一种一边学习电气工科，一边学习声乐和作曲，而且还要自食其力去挣钱的生活。

在《厦门旭瀛书院报》^②第六页，第四十六号，本科第七期，有对江文也君的介绍。原文为日文，现翻译如下：江文也书院毕业后在长野县立上田中学留学，而后进入东京武藏高等工业学校，作为兴趣爱好，进入东京音乐学校夜校学习声乐。武藏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从师山田耕作学习音乐。不单单以我国近来崭露头角的后进声乐家名声大噪，也以一位作曲家的身份逐渐发挥着影响。

二、江文也家人在厦门

1916年后，江文也举家定居厦门的成员，除父母、兄弟外还有其两位伯父及其家人。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开战，1895年4月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整50年。台湾从此取消科举考试，所以在1895年包括父亲在内，老大江呈辉、老三江保生三兄弟受父命返回祖籍福建参加过晚清科举考试，三人均考得功名。

1. 父母

江文也父亲名叫江长生，又名江蕴均，排行老四，是清末秀才出身，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早期从事教学，也当过一段报馆的印刷工，后来负责家族商业事务，主要经营航运。由于日本对台殖民势力的增大，江家随将事业逐渐转回大陆。1916年江长生携其家人定居厦门，1932年因家族经营管理不善，

① 图片来源 《厦门晚报》电子版，照片现由高振碧珍藏。

② 《厦门旭瀛书院报》昭和十年号。厦门旭瀛书院编。昭和十一年（1936）八月三日印刷，八月五日发行。由于是日本人编印，全报文字均为日文。现藏于厦门市图书馆中心馆地方文献库。

遭破产，随后久病卧床达半年。1933年1月24日病逝，此时兄弟三人仅老三文光留在厦门，文钟、文也二人在日本得到消息后，在朋友的接济下，只凑够江文钟一人路费，返回厦门奔丧，将其父葬于厦门。据此分析江文也因无处筹借路费，并未返厦参加其父葬礼。江长生一生不但对家族生意倾注全部心血，对三个孩子的教育更是十分重视。江文也的母亲郑氏名闺，出生于台湾花莲的一个商人家庭。“母亲郑氏嫁过来是虽然不识字，却绝顶聪明，先从父读书，又在私塾旁听三个儿子课读，几年后，竟能为夫婿代笔酬唱，并与日本儿子以文言文通信。又遗传给三个儿子敏锐的艺术细胞，是江家后人极为称赞的一位了不起的女性”^{[5]77}，江文也的幼时曾随母多处领略当地民间音乐。1923年8月4日病逝于厦门。

2. 伯父

江文也共有伯父三人。大伯父名叫江呈辉，又名江蕴玉，青年时曾回祖籍赴考，并考取晚清进士，1917年8月4日去世于厦门，江长生和江保生将其兄葬于祖籍永定高头。另在旭瀛书院的教员名单中有江呈辉的记载，而且也是江文也就读旭瀛书院期间的老师，于1915年4月1日至1917年8月四日讲授汉文^{[6]24}。二伯父是祖父的一个养子，名江永生。“根据三芝乡户政事务所户籍资料，江长生和他的兄弟在1906年（明治39年）三月九日全户迁居三芝，以三芝为户籍地，当时的户长是江永生，江永生于1906年5月7日去世，户长由江长生继承。”^{[4]129}此外，也有研究指出江家内迁后，“留下老二照应台湾的土地房产及基隆港、淡水港的交界站”^{[5]77}。据以上两处分析，三芝乡户政事务所户籍资料的记载应该最为可信。江文也的三伯父江保生，又名江蕴暨，也曾随兄返乡赴考，获得举人，因家庭商业所需，负责长沙等地的业务，并娶长沙女为妻。江保生在厦门活跃于台湾人社群，1910年江保生曾被选举为厦门台湾公会^①的督察。江家内迁后又被选举为厦门台湾公会副会长，长期居住在厦门鼓浪屿。另据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先生所说“江保生曾担任《全闽新日报》社长，

该报不是江保生创办，而是由鼓浪屿清末名士林尔嘉家族创建，日本入厦后，该报社成为日本在厦门领事馆的一个外围组织。”他同时也指出，江保生去世后曾葬于日本人的墓地，日本投降后，墓地遂被推为平地，现已无痕迹，其生卒年月不详。三伯父对江文也的音乐启蒙也有一定的影响。

3. 兄弟

江文也兄弟三人，排行老二，原名江文彬。大哥江文钟，1908年出生台湾，8岁时随父母到厦门后进入旭瀛书院第六期，于1921年毕业后直接去日本求学，入上田中学。毕业后返回厦门，在旭瀛书院任教，在《旭瀛书院创立20周年纪念志》（1930年）^②第22页的职员一项中至第25页，有这样的记录：官职：教务；名称：江文钟；原籍：台北州；任职年月：（昭和）三年（1928年）一月；备考：上田中学校。另外，在《旭瀛书院报》之旭瀛书院创立25周年（1935年）纪念志照片中以及该院第二十一期本科毕业生的师生合影中都见到江文钟的身影和名字（见图2）。同时，也是在该报的第七页记载：昭和五年（1930年）十一月五日20周年纪念式所表彰的职员中就有江文钟君。



图2 江文钟（五排左七）^③

以上表明，1928年1月江文钟已经返回厦门，至少在1935年之前，一直任教于旭瀛书院。据《厦门台湾居留民会报》记载：江文钟在1930年活跃于厦

- ① 厦门台湾公会，于1906年9月成立，1936年，改名为台湾居留民会。它是台湾籍民的核心团体，是厦门最大的外侨组织，也是厦门城市社会中较有影响的社会团体之一。1928年创建会址于当时的民国路，现址在新华路和中山路的交汇处，厦门市公安局正对面。
- ② 《旭瀛书院创立二十周年纪念志》昭和五年（1930）十一月五日。厦门旭瀛编。厦门旭瀛书院出版第十号。由于是日本人编印，全报文字均为日文。现藏于厦门市图书馆中心馆地方文献库。
- ③ 图片来源 《旭瀛书院报》。

门台湾人社群,担任厦门台湾居留民会的议员^{[7]12451}。后来仍见他在日本的相关记录,如1933年父亲去世后,独自从日本返厦参加父亲葬礼和1934年江家三兄弟在日本东京银座的照片(见图3)。可以看出,江文钟返回厦门以后曾多次往返于日本与厦门之间。



图3 1934年江家三兄弟

(左起:老三江文光,老大江文钟,老二江文也)^①

江文钟1934年在厦门成婚,江文也从日本返回厦门参加其兄婚礼,同时还在青年会等场所参加声乐演出,获得较大影响。这是江文也留日期间唯一的一次返回厦门省亲。以后,江文也不断将其获奖作品频频寄回厦门其兄处。不久江文钟返回台湾任教于纯德女中(现淡江中学),从此定居台湾,20世纪90年代末,逝世于高雄。

三弟江文光,1912年出生台湾,4岁随家人一同来厦,并随其兄进入旭瀛书院第十期读书。毕业后入厦门同文书院读书^②。父亲病重时,他一人留在厦门照顾父亲,并任教于集美小学,父亲去世后曾随长兄赴日本。同年,由日本上野转赴台湾。另外,也有资料提及江文光曾入读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但是作者未收集到任何相关资料,故不作介绍。1934年8月江文也随“乡土访问音乐团”回台湾访问期间,“曾要求弟弟江文光带他到处看看,同时也积极采集了台湾各地的民歌带回日本,以丰富其创作资源”^[8],后

来这些素材便成为《白鹭的幻想》创作的主要音乐资源。在遗留的乐谱中,有“文光采谱”、“文光整理”的注记,江文也根据台湾民谣改编的声乐套曲之第五首台湾民间情歌《海边风》就是江文光的采谱。1936年4月江文光因患盲肠炎早逝,葬于台湾。江文也在1936年完成的钢琴曲《十六首断章小品》中的第七首《墓碑铭》便是为了纪念弟弟江文光的逝世而作。另外,在其发表的《黑白放谈》中还写了一首短诗《挽歌——给亡弟》,内容体现了江文也对亡弟深深的思念和悲痛之情。可以说厦门对江文也三兄弟的一生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三、江文也与旭瀛书院

1. 入学

1917年江文也与其兄文钟、其弟文光一起进入厦门旭瀛书院学习(见图4)。同时,据《旭瀛书院报》的明确记录,江文也入读的是小学本科第七期^[9],而不是第八期。按时间和地点推测,江文也包括江文钟和江文光入读的校舍可能是城内分院和小榕林两处中的一个。旭瀛书院的建院经过及招生情况,向我们展示了江文也在厦门学习的相关信息。



图4 旭瀛书院^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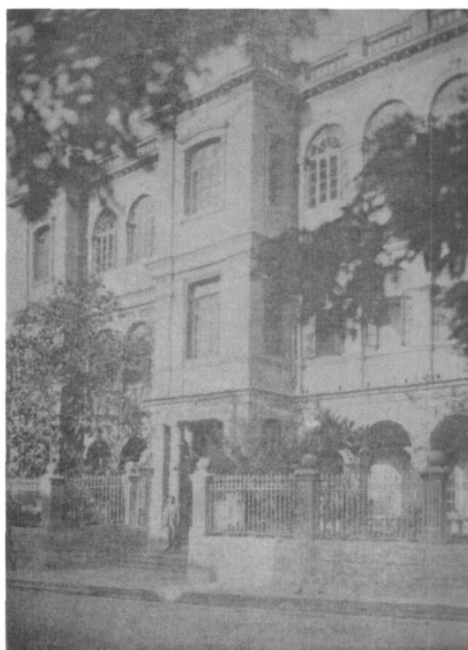
《厦门旭瀛书院创立20周年纪念志》第一页“书院沿革大要”记载: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由厦门台湾公会向台湾总督府申请在厦门设立专门供台湾籍子弟就读的教育机构。翌四十三年(1910年)

① 图片来源 《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99页。

② 胡锡敏在其著作《中国杰出音乐家江文也》中提到的是上海同文书院,该院是日本人于1901年在上海创设的日文书院,全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但是,笔者认为,江文光就读的不是上海同文书院,应当为厦门同文书院,1922年同文书院校舍从脚下搬迁至山顶,就在三十六崎顶旁,自然离江家很近。另一方面,江文钟和江文也的先后赴日,加上其母病逝,文光较小,其父应该留江文光在身边才是。所以笔者认为江文光就读的应该是厦门同文书院。

③ 图片来源 《厦门市志》:第四卷,第2885页。

八月二十四日在厦门市内山仔顶桂州堆一所民屋开校，同年十一月五日举行开院式；大正二年（1913年）八月，鉴于学员人数增多，校舍并和宿舍迁至李厝墓小榕林^①（见图5）；大正四年（1915年）五月城内和外清两分院校舍购地着手筹建；大正六年（1917年）十月城内分院校舍落成（见图6）；大正七年（1918年）二月外清校舍分院^②（见图7）举行开学式；大正十二年（1923年）一月小榕林新楼宿舍新建；同年十二月城内分院增建校舍落成；大正十四年（1925年）二月鼓浪屿设立分院^③（见图8），该分院也称旭瀛书院商业分院，从分院名称来看，该分院应该是以开设商业科学学习为主的校舍。同年，还并购小榕林旧楼一部，12月购买城内分院加以改建，昭和四年（1929年）10月和11月，书院长宿舍和城内分院三楼大礼堂先后落成。以上资料在《旭瀛书院报》第二页“书院沿革梗概”中有完全相同的记载。城内分院校舍今在新华路靠近中山路口的公安局院内，公安局虽经过几次改建，但是至今仍然留有一处旭瀛书院的校舍建筑，是一座三层小楼，和旧照原址相比，外观已有很大改变，难以辨认（见图9）。笔者经洪卜仁先生具体指点，亲临公安局三次寻找，才最终发现。该楼现在是厦门市公安局的档案处和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前也曾做过公安局的展览室，城内分院校舍的其他建筑已毫无痕迹。另据洪卜仁先生介绍小榕林的校舍早就被改建，具体拆除时间不确定，其校舍建筑也是早无痕迹。

图5 小榕树林分院^④图6 城内分院正门^⑤图7 外清分院^⑥

- ① 李厝墓巷：在思明区小走马路至马柱巷。
- ② 外清巷：在思明区桥亭街至苏厝街，现在群惠小学校址。
- ③ 鼓浪屿分院：在鼓浪屿鼓新路43号“八卦楼”内。
- ④ 图片来源 《旭瀛学院创立二十五周年志》。
- ⑤ 同上。
- ⑥ 同上。

图8 鼓浪屿分院^①图9 旭瀛书院原址现貌^②

从记载得知,旭瀛书院共建有四个校区,1917年江文也入校时,正好城内分院校舍落成,在这之前书院的主要设施已经搬到李厝墓小榕林校舍,而且两处都离三十六崎顶较近,尤其是小榕林校舍,而且随后两处校舍都得到不断的改建和扩建。因此,江文也就读的校舍应该是这两校舍中的一个,由于没有可靠资料,这也仅是作者的猜测,其资料有待进一步查找。像最早的山仔顶桂州堆和后期鼓浪屿分院,应该和江文也没有任何联系,前者是开院时江文也还未曾入厦;后者是开院时江文也已经赴日留学。至于外清分院的可能性很小,其原因是该校舍的各项设施及师资力量上不如城内分院和小榕林,再加上外清巷离江家最远,江家三兄弟应该不会舍其近而就其远。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外清分院是江文也入读旭瀛书院的第二年才投入使用,是晚于江文也入读时间的,所以该校舍也应当排除。

旭瀛书院是以招收台胞子弟就学为主的日文字学校,平时经费以及购买地皮兴建校舍等大项开支除了由台湾公会负担及捐款外,主要来自台湾总督府的支

持,院长及教师也是由台湾总督府派出。“仅1915年到1930年的16年间,台湾总督府共补助210501元,平均每年13156元”^{[7]16}。历任院长小竹德吉、冈本要八郎、庄司德太郎都是日本人,并且担任台湾公会的顾问。教员和教务都受日本领事监督。《厦门旭瀛书院创立二十周年纪念志》记载:首任院长小竹德吉自建院出任到大正二年(1913年)返回台湾医病,十月二十六日在台北医治无效逝世。随后,十二月二十二日冈本要八郎出任该院院长,至昭和三年(192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卸任,由庄司德太郎接任。从时间分析江文也就读时的院长一直由冈本要八郎担任。

书院所设业科有小学本科、特设科、高等科、商业科等^{[6]34},“以初等教育及实业实习教育为主”^[10]。全院学生至大正四年(1915年)开始全部统一制服。“以1935年为例,该年有15个年级,教员23人,学生560人,其中台湾籍民466人。1915年到1921年,毕业生合计853人”,“书院在校学生最多时达到900名”^{[7]18-23}。据书院准确记载江文也就读的是小学本科,入校那年共收134人,其中男生91人,女生43人。于1923年毕业的人数54人,办理退学的有216人,出外留学人员8名^{[6]36-38}。江文也应该属于出外留学人员。

旭瀛书院校舍和教材等设备,在当时很先进,图书室和网球场等皆向一般民众开放,而且书院的社会实践活动及文娱活动相当频繁,师资也比较优越。所就读的台胞子弟中,大多和江文也一样,是从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来厦门定居就学,还有一些台胞子弟是尽管家长并不在厦门,而是把子女送到厦门就读,主要是为了能学到中华文化。可以说旭瀛书院为当时的基础教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培养了一些人才,毕业后有的到日本、台湾、东北、上海、厦门等地继续求学,有的直接进入商界、医药界和教育界工作。1945年10月厦门光复,旭瀛书院由台湾同乡会接收,改为复华小学。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再改为新华小学,后来并入群惠小学,校址仍在,但校名不复存在^[11]。

2. 所学

在收集到的资料中找到了明确记录1917年至1923年的相关课程及教师名单,但是教材及同学的

① 同前。

② 图片来源:作者摄。

名单未有任何收获。同时，有几点相关的资料对江文也的书院学习情况也可窥探出一二。

《旭瀛书院创立二十周年纪念志》中记载了1935年之前的所有课程及任课老师，江文也学习期间的老师及课程有：汉文科（江呈辉、叶君德）、华语科（洪豪元）、裁缝科（陈氏阿招、安重初技）、英语科（王傅新、洪嘉裕），另有日文教授冈本宪三和张松、安重龟三郎、刘阿旺、徐鸿涛、中岛利重、林恒彰等十八名训导。国画科、商业科，医科等课程江文也入读是虽有开设，但是未见对其授课老师的记录名单。在所开设的课程中，根据所学专业的不同，授课也各不相同。由于是日文书院，所以日文课程的学习占主要地位。但是汉文和华文两科也得到相当重视。在江文也学习期间记录的任课教师的名单中，日本老师有8位，主要来自长野、茨城和爱知县；台湾籍教师有16位，大多来自新竹、台北、台南等；福建省内的就有五位，数量最少。另外在《厦门旭瀛书院报》第10至11页中关于“学艺会”记载，该会每年都有相关活动，其节目单的内容包括唱歌、朗读、舞诵、对话剧、理科实验、唱歌剧、儿童剧等，参加人数达千余人，所有节目表演人员皆为本院学生，学生的每次动情表演、歌唱都使到场的观众非常满足。这项纪录虽在江文也之后，但是，这些活动可能在江文也时期就已经存在，其本人也参与过。

这些课程及相关活动对江文也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江文也热爱绘画、懂医学、会一定的英语，并擅长诗歌，包括以后走音乐之路都与这时期的学习有极大的关联。至于相关的教材及同学名单或照片，没有查到任何资料。

随着江文也在日本音乐界的影响不断提升，旭瀛书院对其在日本的相关活动极为关注，遂以其为旭瀛书院的骄傲，视为该院培养的最为突出的毕业生。以下是当时《旭瀛书院报》为江文也在日本的音乐学习和参加比赛的相关情况的及时报道。

其一，《厦门旭瀛书院报》第四十三页，第五点第二条，译文如下：毕业生的消息：数年前从我们学院毕业的江文也，由于山田耕作的推荐进入了音乐界，作为声乐家已经在业界相当有名气。众所周知，他以世界音乐为目标不断努力着，现在在作曲方面有着天才般的才能。今年（1935年）夏天所举行的奥林匹克艺术竞技比赛，他将有作品参加，这不仅是他

的荣誉，更是我们书院的荣誉。在即将来到的六月，我们共同祝愿他取得成功。

其二，《厦门旭瀛书院报》第四十四页引用《日本艺术》杂志中的内容译文如下：日本体育艺术协会发动了艺术日本总动员，期待今年夏天举行的特种艺术竞赛取得成功。参赛种类有绘画、彩雕、音乐、板书。其中，音乐的报名截止到（二月）五日。参赛乐曲数32首，其中歌曲9首，室内乐5首，交响乐18首。歌有箕作秋吉的作品，室内乐有江文也、诸井三郎的作品，交响乐有山田耕作的作品。这些作品将在二月底前由山田耕作、诸井三郎、信时洁氏他们审查员审查，通过的9首，赌以故国的名誉参加比赛。

以上的报道和论述虽然不是江文也在厦门的情况，但是发表于厦门，在厦门的音乐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对旭瀛书院以及对厦门都带来很大的影响，必然是研究江文也与厦门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江文也与厦门基督教青年会

在当今对江文也研究的成果中，多有提及江文也与厦门基督教青年会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在台湾的相关论著中。但是，无论是在收集到的资料中还是青年会相关人员的介绍，都没有发现任何江文也与青年会的联系。厦门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明士斌先生和多位牧师也都提到1930年之前青年会在厦门曾举办过体育运动会，获得较大影响，并没有举办过任何与音乐相关的活动，包括唱诗班。更没有听说过江文也其人及其与青年会的任何关系。但是，他们也提到由于年代较远加上青年会相关资料大多遗失，相关史实记载，青年会内部也比较缺乏。此外，最早提及此事的是江文钟之子江敏德的介绍，所以，江文也与基督教青年会的联系应该比较可靠。笔者接下来根据所收集到的资料做出以下论述。

江文也受父母的影响在台湾时就表现出良好的音乐天赋，幼时跟母亲学习哼唱摇篮曲，还自学多首当地山歌，而且常到附近教堂趴在窗口跟唱“圣诗”，加上他天生喜爱唱歌，定居厦门后，西方传教士成为江家常客。《厦门基督教青年会二十五周年纪念册》^① 19第一页中记载：厦门基督教青年会创立于1912年，

① 《厦门基督教青年会二十五周年纪念册》中华民国元年——二十五年。厦门基督教青年会编，厦门基督教青年会印刷出版。现藏于厦门市图书馆中心馆地方文献库。

设会所于鼓浪屿，随后迁至小走马路榕林别墅为会所。小走马路与中山路的步行街交错，就在三十六崎顶的后面，自然离江家很近。被厦门基督教青年会“唱诗班”选去唱圣诗是极为可能的。关于“唱诗班”具体成立于何时，至今已无明确记载，在《纪念册》中记载的“青年会”设立并从事的相关活动中有关于礼拜会和音乐教导的相关活动。在“礼拜会”的活动中提到“举办旅厦基督徒联合礼拜会，定于每星期日下午五时，在会开会崇拜，敦请教会名人用国语主讲，并有音乐及唱诗班”^{[7]44}。在“音乐教导”的活动中提到“本会增进教会各青年之感情，由学生干部郑德超君负责，指导……，有固定时间以资练习。此外，于会内，更设有唱诗班欢迎青年同志入学，亦由邓君主教”^{[7]76}。这两项活动都提到了“唱诗班”，那么，在江文也时就已经成立“唱诗班”是有可能的。以上论述和相关记载虽多有猜测，但是江文也在厦门基督教青年会唱诗班唱过“圣诗”，也是可以成立的。“可以说他最早接触的音乐是圣咏，认识的第一件乐器是教堂的风琴”，“青年会也就成了他音乐启蒙的地方”^{[5]18}。

胡锡敏提到“教堂音乐对江文也来说并不陌生，他童年在厦门就常去听教堂音乐。从小就唱圣歌。教堂的钟声不但没有把江文也唤入宗教的寄托中反而振响了他创作的音弦”^{[5]36}。“他在天津首度被抓，释放后，一度失业，躲进天主教圣方济会，每天接触教会经文，少年时代在厦门青年会唱圣诗的情怀又涌现了，加上教会也邀请他写曲子，于是天主教首度中国风的圣诗产生了”^{[5]83}。这些资料同样论述了江文也曾 在基督教青年会最早接触宗教音乐，唱过圣诗，学习过西方音乐知识的情况。另外，“1934年江文也利用暑假回厦门省亲，被邀请到青年会演唱，立即风靡了上流社会的少女们，出尽风头”^{[5]81}。江文也在基督教青年会的经历，为其声乐之路以及以后的宗教创作，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

五、江文也与厦门相关的创作

在江文也的音乐创作中，直接与厦门有关的作品非常的少。首先是王震亚先生提到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天津筹办中央音乐学院，我由上海到天津，听说北京艺专音乐系有一位著名的作曲家江文也，将和艺专师生一起到天津参加建院工作。艺专同志们到天津后，教师们开了一次联欢会，江文也先生即席在钢琴上弹奏了他创作的《厦门渔夫舞

曲》。作品很流畅，他的演奏也很流畅”^[13]。另外，在《江文也音乐作品目录考》中提到“《厦门渔夫的舞曲》（从欢迎台湾省参议会考察团同乐音乐晚会——1948年4月30日节目单中所得）”^{[14]95}，王震亚先生并未提到这首作品的创作年代，而后者所提到的演出年代正好是江文也先生在联欢会上即兴演奏之前，应该说这个创作时间是最为可信的。这首作品以厦门为主题，根据福建民歌所改编，应该是对厦门渔夫劳作生活的描述。但是，这首作品并未编号。其次是梁茂春先生写到“在江文也1948年自己编的《作品表》（1948年4月30日江文也独唱、独奏音乐会节目单的附件）中，列入的这一时期的钢琴作品还有《三首厦门歌曲》作品4号”^{[3]100}。后在《江文也音乐作品目录考》中，为了与《五首素描》的作品编号相区别，编者以Op.4(1)示之。至于《厦门渔夫舞曲》是否是《三首厦门歌曲》中的其中一首有待进一步考证。

同时，江文也一生曾多次收集和整理福建民歌，“1963年，听了院长赵凤关于加强中国民族音乐的学习和研究的报告会，动手整理自己近三十年来收集的台湾、福建等地民歌”^{[14]77}。这些民歌虽没有说明具体乐曲，也没有进行多少改编和创作，但是也多少能表明江文也曾对厦门的民间音乐的收集和整理做过一定的工作。

结 语

江文也在厦门生活的六年中给他的一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其一是创作，良好的家庭熏陶和社会氛围，以及入读旭瀛书院和加入厦门基督教青年会，并吸收了相当的当地乐曲和学习了一些西方音乐知识，都对他的音乐创作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二是声乐方面，由于从小喜爱唱歌，并进入厦门基督教青年会接受良好的音乐启蒙培养和进行科学的发声练习，为他以后在日本的演唱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三是入读厦门旭瀛书院，丰富的书院课程学习以及良好的师资力量，在音乐、绘画、诗歌、日文、华语等文艺方面，包括医学上的学习，也为他带来很好的声誉。其四就是对宗教音乐的接触，不仅在声乐方面有影响，对其以后宗教音乐的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于1946年至1948年之间为天主教创作的《圣咏作曲集（第一卷）》、《第一弥撒曲》、《儿童圣咏歌集（第一卷）》和《圣咏作曲集（第二卷）》四部中文圣乐歌集，其中共收录了江文也的中文原创圣乐作品六十四

首^{[14]358}, 在江文也的创作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最后就是对江文也音乐思想的影响。江文也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相当重视与之相关的人文知识的汲取与积累。尤为重要的是, 他有意识地将祖国传统文化作为创作的根基于灵感的源泉”^[15]。他一生都在思考“天人合一”的音乐哲学观, 努力从其哲学观念中寻找创作灵感并加以发挥, 将浓郁的东方文化色彩的音乐观与西方音乐情感完美融合。这种音乐思想的形成, 表明作曲家内心蕴藏的祖国文化意识, 厦门的学习成长, 对其音乐思想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值此江文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笔者作为一名中国音乐史方向的研究生, 深知江文也对我们音乐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 在此对其进行相关研究以此表示深切的怀念。本文对较多论点进行实地考察, 争取把江文也在厦门几个比较重要的地点及相关活动, 找到最为详实的资料进行论述。比如家庭住址、旭瀛书院、厦门基督教青年会、社会活动等方面, 都有可靠的资料和照片为依据。由于年代较远, 资料相当缺乏, 不可能对江文也在厦门的所有资料都能收集到。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虽有较多的引用, 但是, 也有相当论述和前人的研究存有差异。笔者对江文也的研究将会继续下去, 也希望更多的研究者加入这个行列, 如此, 相信对江文也在厦门以及其他的相关研究, 将会不断的深入, 取得更为丰富的成果。

参考文献:

- [1] 韩国镛, 林衡哲. 现代音乐大师江文也的生平与作品 [M]. 台湾: 前卫出版社, 1989: 18.
[2] 李岚清. 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 [M]. 北京: 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09: 300.

- [3] 张己任. 江文也研讨会论文集 [C]. 台湾: 台北县立文化中心出版, 1992.
[4] 周婉芬. 想象的民族风: 试论江文也文字作品中的台湾与中国 [J]. 台大历史学报, 2005 (35): 129 - 131.
[5] 胡锡敏. 中国杰出音乐家江文也 [M]. 香港: 香港上海书局出版, 1985.
[6] 旭瀛书院. 旭瀛书院创立二十周年纪念志 [M]. 厦门: 旭瀛书院印刷出版, 1930 (昭和五年).
[7] 厦门台湾居留民会. 厦门台湾居留民会报: 厦门台湾公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 [M]. 厦门: 厦门台湾居留民会印刷, 1936 年.
[8] 张己任. 江文也荆棘中的孤挺花 [M]. 台湾: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2002: 26.
[9] 旭瀛书院. 旭瀛书院报 [M]. 厦门: 旭瀛书院印刷出版, 1936 (昭和十一年): 6.
[10] 厦门地方编纂委员会. 厦门市志: 第四卷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4: 2885.
[11] 厦门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 厦门市志 (民国)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9: 312.
[12] 厦门基督教青年会. 厦门基督教青年会二十五周年纪念册 [M]. 厦门: 基督教青年会印刷出版, 1936 (民国二十五年).
[13] 王震亚. 作曲家江文也 [J]. 人民音乐, 1984 (05): 18 - 35.
[14] 梁茂春, 江小韵. 论江文也: 江文也纪念研讨会论文集 [G]. 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 2000.
[29] 修海林. 音乐学至统合 [M].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8: 126.

【责任编辑: 胡 娉】

Jiang Wenye & Xiamen

Cao Guo - liang

(Department of Music , Art College of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 Fujian , 361005)

Abstract: Jiang Wenye was a world - renowned vocalist and composer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music. His family lived in Xiamen from 1916 to 1923 , and then he went to study in Japan. His 6 years of childhood in Xiamen greatly affected on his whole life. The article 's discussion is mainly based on his activities in several important locations in Xiamen , such as his residence , Xu Ying College , YMCA and so on. His life and study in Xiamen left prints on his music. He created some religious music and music based on Xiamen theme.

Keywords: Jiang Wenye; “Water Fairy House”; Xu Ying College; Xiamen YMCA